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研究

主编 靳辉明
副主编 王煜



中国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重点项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研究

主编 靳辉明
副主编 王煜

海南出版社
·1998·

责任编辑:蔡 瑞
特约编审:周 奇
封面设计:尚佩芸
责任校对:智福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

主编 莫辉明 副主编 王 煜

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570216〕海南省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2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二三二工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6.25 字数:399千字
1998年12月第1版 1998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645-224-9/D·3 定价:(平装)27.00元
(精装)32.00元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 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 结合的理论成果	(33)
第一节 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特征的历史条件	(33)
第二节 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	(47)
第三节 苏联、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 历史经验	(56)
第四节 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伟大实践	(66)
第二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 哲学基础	(72)
第一节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 精髓	(72)
第二节 邓小平对唯物辩证法的创造性运用和 丰富	(94)
第三节 邓小平哲学思想的重要地位与意义	(121)
第三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	(135)
第一节 理论基石与理论体系	(135)

第二节	社会主义本质论	(142)
第三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	(152)
第四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	(162)
第五节	社会主义改革论	(174)
第四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		(190)
第一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和生产 关系	(192)
第二节	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 发展	(206)
第三节	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形式	(217)
第四节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227)
第五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		(240)
第一节	我国现阶段的政治上层建筑和经济 基础	(241)
第二节	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254)
第三节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 制度	(268)
第四节	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	(278)
第五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族政策和祖国 统一方针	(290)
第六节	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	(304)
第六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		(316)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我国现阶段 的经济政治	(317)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		

内容	(330)
第三节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原则 和方针	(341)
第七章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		
纲领	(358)
第一节 党的基本路线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的集中体现	(358)
第二节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社会主义 现代化	(372)
第三节 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 是强国之路	(387)
第四节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全面建设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	(403)
第八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 重要范畴		
	(416)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范畴体系的构建及其 发展	(416)
第二节 一般原理和中国特色	(426)
第三节 制度和体制	(436)
第四节 计划和市场	(446)
第五节 公平和效率	(455)
第六节 发展和稳定	(463)
第七节 民主和法制	(474)
第八节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484)
第九节 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	(495)

结束语 (507)

后 记 (509)

导　　言

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中国走过了漫长而艰难的道路，其间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诸历史阶段。在这个过程中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即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即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都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本质和规律的理论概括。它遵循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又具有中国特色，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具体历史条件下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邓小平理论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它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指引我们实现新的历史任务的强大思想武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是正确地掌握这一强大思想武器的现实要求。本书是集中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新的尝试。

一　理论表达的逻辑形式

伟大的实践，产生伟大的理论。而理论只有成熟，才能有效地指导实践。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近二十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对其经验的理论总结，这个理论正

在走向成熟。当然,它还要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继续完善、丰富和发展,有些原理也还要继续经受实践的检验。之所以说它走向成熟,不仅因为反映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一系列基本原理已经确立,而且还因为揭示这些基本原理的内在联系的逻辑结构也已经形成。理论不是为了体系而存在,但是,一个成熟的理论必然以一个科学体系的形成为标志。所谓科学体系,就是反映事物本质和规律的一系列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的内在逻辑联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看成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①。如果只是一些个别观点、个别论断,而没有形成原理和观点的系统,就不能说这个理论已经形成。

一般而论,任何一个科学理论,都有一个思想体系。这是因为,一个理论总是以一定的思想形式表现某些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过程的。而这个事物及其运动过程,并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一个有序的系统;反映其本质和内在联系的认识,就是思想体系。思想形式是主观的,而其内容是客观的。一个科学的思想体系,就是主观和客观这两方面的有机统一。它是在实践过程中,经过反复的认识而得出的理论升华。

从理论体系的形成来看,有些是理论创立者本人经过专门的理论研究而建立起来的,有些则是理论创立者提出思想和观点,经过理论工作者的精心研究,加工制作,而确立起来的。这两种情况在历史上都曾出现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就是根据理论创立者的观点和思路,由理论工作者经过潜心研究而加以阐发的。由于理论工作者占有材料和研究问题的角度的差异,对同一理论可能会出现不同的思想体系,不同的逻辑结构,但经过反复比较和认识的深化,这一理论体系的表述会更趋完整和科学。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171页。

思想体系、逻辑结构，是一个理论赖以建立的形式，是理论存在的重要载体。过分囿于理论体系而忽视其精神实质和现实意义是片面的，但忽视对理论体系的研究和建立也是片面的。必须防止这两种片面性。要完整、准确地掌握邓小平理论，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就必须掌握这一理论的科学体系。因此，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决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而是关系正确领会这一理论的精神实质，科学地掌握这一强大思想武器的现实需要。

二 艰辛探索的历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其科学体系，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后果为基础的。”^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适应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现实需要应运而生的，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践的理论表现。正如马克思所说，它同任何体系一样，也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为它的产生提供了客观基础。没有这种社会实践，便不可能产生与之相应的理论。这种理论的表达形式，主要是从实践经验中抽象出来的，是通过对实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版，第544页。

践经验的理论总结和概括而形成的观点、概念的体系，但是，它又不可避免地被过去的政治、哲学、文化发展结果所制约。不了解这一点，便不可能正确把握体系的理论内容，也不可能正确理解其逻辑形式。

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最大特点和优势，是善于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各个时期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走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我们党没有照搬苏联革命的模式，而是根据中国具体情况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从而取得胜利的。正如邓小平所说的，中国革命就没有按照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去进行，而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否则，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同样，在中国搞社会主义，不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只能搞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必然要求和结果。只有一般原理而无特色，就会沦为教条主义；而只有特色却丢掉一般原理，又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走到邪路上去；唯有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在当代中国将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使社会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开花结果。我们党的几代领导集体，为此进行了艰辛的探索，经历了艰难和曲折，最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就开始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胡绳在为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而写的《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一文中指出：“毛泽东所做的第一件大事是领导党和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要战胜如此强大的敌人，中国革命不能沿袭别国的模式，而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独特的道路。第二件大事是在以带有中国特色的方法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努力探索中

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毛泽东是这种探索的开创者。他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抗拒来自国外的强大影响和强大压力，从而发动并且坚持进行这种探索。所以，毛泽东作为这种探索的开创者的历史功绩应当用最浓的笔墨记载在史册上。”^① 胡绳对毛泽东的历史功绩的这种评价是完全正确的，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关于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我们只想简要地强调以下几点：

第一，倡导和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毛泽东从理论到实践自觉地解决这个相结合的问题，并将它作为革命和建设的最根本的指导原则，这不仅对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而且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没有这条根本原则，一切都无从谈起。邓小平十分中肯地指出，毛泽东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江泽民强调说：“毛泽东同志是实践这种结合的光辉典范。他提出的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原则，他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和党的建设方面所做的不朽贡献，他对社会主义建设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的正确思想，都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丰富和发展，都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② 对毛泽东的这个功绩无论怎样估价都不为过。

第二，强调和坚持不照搬苏联模式，走自己的路。

从 50 年代中期，在《论十大关系》形成过程中，毛泽东就不止一次地强调，社会主义建设不能走苏联的老路，提出“以苏为

① 《人民日报》1993 年 12 月 17 日。

②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一九九一年七月一日），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0 页。

鉴”，避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错误，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经验，探索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强调“要打破迷信，不管中国迷信还是外国迷信”，学习苏联也不要迷信。他提出一切国家的先进经验都要学，也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论十大关系》表明，我们党鉴于苏联建设社会主义中的失误，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正是由于我们党破除迷信，不照搬苏联的模式，才真正开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当然，在开始探索时期，也不可避免地会犯某些错误，这从认识论上来讲，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第三，鉴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失误，我们党在经济、政治、科学文化建设方面，另辟蹊径，采取了许多有别于苏联的新的做法，为后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准备了有价值的思想材料和经验。

在经济方面，针对苏联“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倾向，毛泽东提出“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按照“农轻重”次序安排经济建设，正确处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等方面的关系，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初步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若干新方针。关于商品生产，也在一定范围内作了有益的探索。毛泽东从我国存在两种所有制的现实出发，为了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提出要发展商品生产。他认为，我国是商品生产最不发达的国家，目前我国商品生产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应当利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形式来促进生产的发展。他批评有些人主张过早地消灭商品生产，说：“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有不少人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商品的本质差别，没有懂得利用其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

的表现，不认识五亿农民的问题。”^①他还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概念，认为这种商品生产“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有计划地进行的”。他提倡要向价值规律这所“大学校”学习。显然，毛泽东关于商品生产的思想已大大超越了以前社会主义的实践家们，由于当时的客观形势和认识的限制，毛泽东不可能从理论上真正解决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问题，但是，这些认识对后来的探索无疑有着直接的促进作用。

在政治方面，我们党创造性地实行了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其本质特点是广大人民享有充分的民主，而对少数反动派实行专政。毛泽东同志提出并在中国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议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针对苏联一党制的弊端，总结了我国多党联合的历史经验，毛泽东确立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这样一种独特的多党制形式。他说：“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实现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发挥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这种形式将要长期存在下去。实践证明，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行之有效的、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我们今天进行的政治改革，就是要进一步完善这种政治制度，使之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要求。

在科学文化方面，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需要，我们党十分重视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重视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鉴于苏联在学术批评中的粗暴作风和教条主义倾向，毛泽东用唯物辩证方法，分析了当时社会矛盾和科学文化领域的矛盾的特点，倡导实行学术自由，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繁荣

^①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我国领导人论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200、201页。

社会主义科学文化的方针。在艺术和学术领域，好的与坏的、正确的与错误的，总是同时存在的，往往相互交织在一起，只有通过比较和鉴别，通过自由讨论，才能分辨是非。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有鉴别，有斗争，才能有发展，才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在这里，行政命令是无济于事的；只有实行学术自由，创造自由探讨的学术氛围，才能真正解决思想文化领域的矛盾。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思想斗争同其他的斗争不同，它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细致的讲理的方法”。 “双百”方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方针，其基本含义有两个方面：一是通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进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和学术理论的繁荣、发展；二是通过“双百”方针不断扩大社会主义思想阵地，逐步解决意识形态领域“谁战胜谁”的问题。实行“双百”方针是有前提的，就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持毛泽东提出的六条政治标准。这六条标准是：（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毛泽东认为：“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① 这些政治标准不仅是解决思想文化方面问题的原则，也是我国政治生活方面必须遵循的原则。

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个方面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为了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需要，毛泽东提出“向科学进军”。在科技领域缩短同西方国家的差距，并准备赶超他们，知识分子问题就自然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被提了出来。周恩来在1956年1月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指出：“社会主义建设，除了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789页。

以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也就是说，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他还强调，我国知识分子中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①。这是我们党和政府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一次正确表述，它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毛泽东同志不断强调，对知识分子一要发挥作用，依靠他们，二要加强党的领导。他特别强调，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希望我国的知识分子，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尽管后来在实践中出现过这样那样的失误和问题，但这些思想和影响是不可抹杀的。

第四，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为巩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的发表，在国内外引起极为强烈的反响，被认为是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件大事，是对马列主义的重大发展。苏联哲学博士斯捷潘年科发表评论，称赞“毛泽东同志文章的原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统一不排斥矛盾”，“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毛泽东同志的讲演是在深刻地概括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丰富的新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典范”。匈牙利党的机关报发表题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的社论，认为毛泽东的讲话是“以新的观点，创造性的方式，照耀着整个工人运动的理论和实践的讲话”。社论同时指出，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在匈牙利有着重大意义。^② 这些评价是客观的，也是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0、162页。

②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595～596页。

恰如其分的。它表明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在当时发生了重大影响，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主要理论思想可以简要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 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首次鲜明地创立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按照唯物辩证法的矛盾法则，不论在自然界还是在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矛盾规律都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当然也不例外。但是，由于思想的禁锢和形而上学方法，当时在苏联和我国理论界都有人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完全适合，没有矛盾冲突”，“和谐一致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种片面的理论和形而上学的方法，会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严重的危害，特别是在实际矛盾和冲突面前不知所措，甚至会出乱子。毛泽东总结了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经验和教训，根据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原理，即对立统一规律，深刻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实际，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事业必定胜利的基本保证。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我们的社会里已经没有任何的矛盾了。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他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①。它不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调整和解决。总之，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② 40年过去了，实践证明毛泽东所揭示的这一伟大真理仍然是颠扑不破的，仍然是我们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57、767页。

^② 同上书，第769页。